



異曲同工的傳教方法

教宗方濟各欽定今年10月為「特殊傳教月」，從以往的傳教主日，伸延至一整個月之傳教月，重新呼籲全球各地教會、所有的基督徒，以10月作為一個祈禱及反省的時間，好重燃教會的福傳熱誠。

「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瑪28:19)傳教因此成為教會的本質和使命，一個不傳教的教會就成了死的教會！傳教是教會的性命，傳教使得教會存在並促使教會成長。每一位受洗者都被邀請把所得的信仰以宣講、見證，傳播給他人。

在教會歷史中有3位偉大傳教士成了我們不同的典範。

1.以祈禱傳教：聖女小德蘭為典範。她屬於加爾默羅Carmelite隱修會的修女，但深具傳教精神，曾強烈表達渴望去外國（甚至想到中國、越南）傳教；她以實際行動教導我們，祈禱能成為普世傳教行動的動力。小德蘭深信「天主是愛」，並認為傳教的動機也是愛，愛心的行動、補贖都能幫助傳教工作。

小德蘭也認為福傳的成果，除了靠講道者的言行和誠意外，也要靠天主的恩寵，人心才可轉化。而祈禱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動力，只要我們有心堅持祈禱，天主必會悅納，使外教人接受福音，並以行動實踐信仰。傳教使命的主角是天主聖神，教宗說：「你與聖神同行。去吧！天主不會讓你孤單一人。你在作見證時，會發

現，聖神已先你來到，為你準備道路」。

2.以行動傳教：聖方濟·沙勿略為典範。主曆1541年，他接受教宗的任命，以羅馬教廷大使的身分來到亞洲，首先到葡萄牙的屬地，這是他偉大的傳教路線之一的首站，並乘船經非洲到印度、麻六甲、印尼諸島、日本，展開福傳工作，歷經11年，這也是他永遠不能返家的傳教路線。當時因著他的宣講而歸依的人數很多，大部分都是窮人、少數民族和低下階級的人；他以實際行動關懷窮人，照顧他們的需要，為福傳歷盡千辛萬苦；他回應天主的召叫勇敢地「走出去」，為福音作生活的見證，提醒我們，離開舒適圈去傳福音，一個走出去直到天涯海角的教會，要求持續性的和永久的傳教歸依。

聖方濟·沙勿略是最偉大的傳教士之一，他向我們展示：這種無限的開放，以慈悲的精神走出去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而慈悲地走出去，所表現的愛及無私的奉獻，必能結出傳教的美果。天主喜愛走出去的教會，如果不走出去，那就不是教會。教會應在道路上，教會應在行走中。一個走出去傳教的教會不會浪費時間，去為那些不順利的事和不再有教友的情況而哭泣，她只渴望做地上的鹽和世界的酵母。

3.以善會支持傳教：可敬者保利娜·雅里各(Pauline Jaricot)為典範。1799年生於里昂，當她17歲時，她的哥哥正準備到中國當傳教士，她竭盡全力支持傳教士的活動。1817年她組織了

第一批傳教士，並推動傳教運動，以自己的每日部分工資來支持傳教工作。她是宗座傳教事業的先驅，這個全球性傳教網絡，運用遍布全世界的基督徒，他們祈禱、傳教宣傳和愛德，來支持教宗的傳教任務。目前有4個支會：聖童善會、聖伯鐸宗徒善會、宗徒善會，以及傳信善會。

早在主曆1543年，聖若望·良納弟(St. John Leonardi)生於義大利路加城附近的一個小鎮；青年時任藥劑師助手，後棄俗修道晉陞鐸品，熱心從事傳教工作。聖人鑒於不少教外民族未得福音真光，就組織一個司鐸團體，乃為培養青年志願到遠處傳播福音(傳信善會)的創始者。因他的號召，許多人出錢出力，熱心支持傳揚福音到尚未認識基督地區的工作。

在現代世界中，傳揚福音有許多方法。

例如：生活見證、透過標記(如矗立的牌坊、十字架、教會的聚會)宣示福音、透過大眾媒體宣講、個人接觸分享關懷、愛德行動等，也就是透過我們生活的種種美好表現，彰顯出天主對人的愛。教宗方濟各強調，沒有人被排除在教會的傳教使命之外。天主召叫每一個人：家庭中的父母親、夢想做大事業的年輕人、在工廠、商店、銀行和餐館的工作人員、失業者、生病者……每人都被天主召叫，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去從事福音傳播工作。教宗方濟各說：「天主要每人把自己當作禮物，獻給天主，走到那缺乏希望和尊嚴的地方，那裡仍然有太多的人還未得享福音的喜樂及救恩。」

值此「特殊傳教月」，讓我們思考：我是否做了福傳？我將以什麼方法傳播福音？



對2020年全國福傳大會的建言之3

■文／周曉青（國際大學英語教授協會／IAUPE會員）



教宗良十三在1879年頒布《Aeterni Patris》通諭中，On the Restoration of Christian Philosophy指出人類的問題是出自「思想上的混亂」。

在19世紀末，天主教最大的敵人就是現代主義(Modernism)。現代主義衝擊天主教的傳統思想，認為科學與經驗學是尋找真理的唯一方法。在這通諭中，教宗要求教會接受聖多瑪斯的神學觀——集結亞里斯多德思想與13世紀伊斯蘭教學者的哲學觀，以面對19世紀末思潮的挑戰。100年後的今天，教會的神學院雖然已經不把多瑪斯的神學作為思想主流，但是多瑪斯神學已完成20世紀教會的階段性任務了。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許多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神學家都是士林哲學出身，現在教會的思想也是奠基於這個思想改革的成果上。

于斌樞機在70年代寫了一篇文章《無形勝有形》，內容針對60年代的歐美思想革命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剖析。中華民國當時也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文化大學就是在這個

時期建立)，雖然今日國家與台灣天主教會內存在著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差距，但當時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中共文革把中華文化摧毀的同時，保全了中華文化的精髓，有如中古黑暗時代教會，使人類文明免於全面摧毀。

在2020年的全國福傳大會中，我們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與方向，那我們便沒有一個感動台灣人民的思想。另外，根據年輕朋友所述，近幾年年輕人熱烈關注的議題是統獨、性別平權運動、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因此，我認為全國福傳大會也必須將年輕人真正在乎的議題納入考量。因為若不能爭取年輕人進入我們的羊棧，10年後，這已老化的教會將沒有青年的接班人。

最近，我從不同的管道中(參考主教團會議)，發現台灣的天主教會計畫將重要資源分配到教會的醫療系統中，期望以菁英化的醫療系統，作為帶領教會未來興榮發展的火車頭。

記得30年前，我在輔大任教時，一位教會神

職界的主管難過地表示，輔大90%的收入是用於支付教職員的薪水上，夜間部是整個大學營運中唯一有盈餘的部門，然而，這些盈餘的資源卻幾乎全數挹注在推展醫學院的計畫上。

倘若教會將愈來愈少的資源，孤注在上述的投資，若此方法成功，將是美事一樁。但我們的教會不是財團，也不是政府，我們僅有非常有限的資源，若成效不如預期，那10年後的教會與下一屆全國福傳大會再也無法擁有任何的資源去發展其他目標。

全國福傳大會好似大公會議一樣，在這個會議中，教友們可以發表他們的意見，大會可以作出共同的決定。

若我們參考教宗良十三與于斌樞機主教的想法，是否在這次全國福傳大會中，我們也應當思考如何運用我們的資源去拓展思想的市場？我們是否應該建立一些中心為教會發展思想的工作？我們是否也可以思考在這個僅有少數人看書閱讀的世代，去發展多媒體與網路傳教機能？